

## 文学研究·“生命写作”专题研究

**【编者按】**“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源自于传记写作,是传记的延伸。发展至今,其涵盖对象已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传记的范畴,既包括自传、他传、日记、回忆录、信件等,也吸收了口述史、录音、影像、博客、微信、电子日志等新兴表述形式。相较于其他文学体裁,“生命写作”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最为直接自我表达,在西方研究界备受关注和重视,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于文学及历史研究之外的显学。“生命写作”所关注的经典话题包括种族、反战、性别、创伤记忆、民族觉醒及民族解放等。近年来,“生命写作”的作者与研究者积极拓宽话题领域,尝试将写作与舞蹈、叙事医学等进行跨领域融合,希望能以更为多样的表达模态和维度,向读者传递更为丰富的生命体验。本专题两篇文章的研究主题分别涉及“生命写作”的前沿与经典话题,各具特色。两位作者中,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阿尔弗雷德·霍农教授系《欧洲生命写作学刊》《自传与传记研究》及《生命写作学刊》等国际学术期刊编委,为国际生命书写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莹研究员多年致力于中外人物传记及生命书写的比较研究,在该领域建树颇丰。我们编发一中一西两位专家关于“生命写作”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希望可使读者领略该学科的前沿关注议题与基础研究范式,并期待引起未来更多关于“生命写作”的学术讨论。

# 传记智识与叙事医学: 创造跨越国界的自我

[德国] 阿尔弗雷德·霍农

**【摘要】**自我的诗意性和叙事性呈现,通常与歧视和疾病有关,这些自传性的诗歌和叙事作品会与心理治疗或医学治疗相互作用。在理想的情况下,生命写作与叙事医学的主体相互合作,产生一种秘而不宣的跨越国界的公共智识形式,超越了单一个体的自我实现,构建起一个相互融合的一体化框架。本文聚焦于著名非裔美国作家奥德丽·洛德罹患乳腺癌后创作的诗歌和叙事日记《癌症札记》,并将其作为叙事医学的一种形式,从生命写作的角度挖掘和探索其中基于种族的跨国自我的创造。

**【关键词】**生命写作 叙事医学 奥德丽·洛德 非裔德国人 多样性在美国和德国

**【作者简介】**阿尔弗雷德·霍农(Alfred Hornung),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王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0)04-0081-10

本文立足于自称为“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恋母情结者和诗人”的非裔美国作家奥德丽·洛德 (Audre Lorde) 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她对乳腺癌的治疗历程,以及上世纪80年代她与柏林自由大学约翰·F.肯尼迪学院的非裔德国学生之间的互动情况。我的论点是以洛德提出的“种族主义是社会癌症”的呼声为指引,这一呼声将大西洋两岸关于歧视、疾病以及医疗的共同经历联系起来。我认为,种族主义和癌症的治愈过程都涉及到以创造跨国自我为目标的多种生命写作形式。从方法论上讲,本文将探讨生命科学与生命写作之间,或者更加具体地说,是生命写作与叙事医学之间的跨学科联系。<sup>①</sup>它涉及到生命写作领域中探讨的一些主题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它与生态学、神经科学和医学研究之间的跨学科交互。<sup>②</sup>它反映了我校(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在德国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的“生命科学与生命写作:在生物医学阐释和生存经历之间的人类生活边界的经验”(Life Sciences, Life Writing: Experiences at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Life between Biomedical Explanation and Lived Experience)研究培训小组所完成的工作。

在本文中,我将重点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将重新评价奥德丽·洛德的一些生命写作作品;然后,分析她在柏林开展的教育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参与式生命写作形式;最后,我将考察自传/传记电影对这种跨国互动的接受程度。

## 一、奥德丽·洛德的多样性与生命写作

国际自传/传记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该协会于1999年在北京成立)及其欧洲、美洲、非洲和亚太地区分会的所有成员,都对各种传记写作形式了如指掌。就探讨生命写作的范围及各种写作方法的文章来说,西多妮·史密斯(Sidonie Smith)和茱莉亚·沃森(Julia Watson)撰写的综述著作《阅读自传》(*Reading Autobiography: 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sup>③</sup>最为出色,二人在文中全面地列出了生命写作的各种体裁。

在前往柏林之前,奥德丽·洛德从种族、性别和医学多样性的角度对这些体裁的种类又进行了扩充,并对部分体裁进行了调整。她发表的第一部自传体作品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部作品标新立异地取名为《煤》(*Coal*, 1976)。同名诗《煤》以自传体特有的标志,也就是人称代词“我”(I)开头,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妻子查米安·基特里奇(Charmian Kittredge)曾将“I”称为“直立的代名词”。<sup>④</sup>这个单独的字母“I”,也是罗马数字I,笔直地站立在诗歌的顶部,好像与第一行完全分离。煤来自于“大地深处”的“漆黑世界”。在整首诗中,自传体传主将自己与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宝藏联系起来,并以实体和物质的形式来呈现自我。

我

是通体的黑,正在发声

来自大地的深处

绽放有千姿百态

① 参见 Alfred Hornung, *Life Sciences and Life Writing*, *Anglia*, Vol. 133 (1), 2015, pp. 37-52.

② 参见 Alfred Hornung and Zhao Baisheng, eds, *Ecology and Life Writing*, Heidelberg: Winter Verlag, 2013; Alfred Hornung, *The Shaking Woman in the Media: Life Writing and Neuroscience*, in Christine Marks and Hubert Zapf, eds., *Zones of Focused Ambiguity in Siri Hustvedt's Works. in Johanna Hartmann*, Berlin: DeGruyter Mouton, 2016, pp. 67-80; 阿尔弗雷德·霍农:《跨国及跨文化视角下的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王小木译,《华夏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第379~390页。

③ Sidonie Smith and Julia Watson, *Reading Autobiography: 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 (Second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④ Charmian Kittredge London, *Our Hawai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 p. 295.

一颗钻石如何化作一团火焰  
一个声音如何变为一个词语，有色的词语  
谁来偿还言说的代价

一些言语光芒四射  
就像玻璃窗上的钻石  
在落日的余晖中歌唱  
还有另一些言语，恰如订书机订上的赌注  
在穿了孔的书上，以收买，以签署，以撕裂  
一切的愿望与可能随之而生  
残存的，唯余  
一颗边缘参差的龋齿  
有些话我压于喉中  
像毒蛇一样滋生  
别人知晓太阳  
像吉普赛人一样在我的舌上寻找  
从我的唇间爆炸  
像初生的小雀破壳而出  
那些话语  
令我神迷

爱，就是绽放的另一种表达  
就像一颗钻石化作一团火焰  
我是黑色的，因为我来自大地的深处  
请相信我之所言，就是你光晕之下的旷世奇珍<sup>①</sup>

这位黑人诗人通过将自己比作煤炭，在升华地位的同时，还以诗人强有力的语言表达激起了人类的同理心。奥德丽·洛德的自传体叙事作品《女同性恋：我名字的新写法》（*Zami: 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sup>②</sup> 则采用她的第二种生命写作形式，这部作品为《煤》中诗意的自我抽象定义注入了关于童年和成年的传记细节描写。所谓“我名字的新写法”是指她父母的非洲加勒比血统；她的极度近视致使她被确认为法定盲人；她在纽约长大时第一次经历的种族主义，以及她突破约束对另一种性形式的发现。除了来自非洲加勒比的血统之外，1954年洛德在墨西哥国立大学的经历为她开辟新的生活方式，构建新型关系以及后来她返回纽约后接受同性恋文化（包括与白人结婚并生育两个孩子）提供了跨国基础。《女同性恋：我名字的新写法》并不是一部“神话小传集”式的作品，而是洛德的代表性自传体叙事札记，描述了她在反抗种族主义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公共自我关系。批评家可能认为，这部作品背离了洛德在1980年的《癌症札记》（*Cancer Journals*）<sup>③</sup> 中在描述自己的乳腺癌疾病、她的反抗精神和生存斗志时所表现出的无比坦率的风格，

① Audre Lorde, *Coal*, New York: W. W. Norton Publishing, 1976, p. 6.

② Audre Lorde, *Zami: 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 New York: The Crossing Press, 1982.

③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97.

将其评价为是一部脱离现实的“神话小传集”。我通过分析发现，奥德丽·洛德的生命写作形式还是一种强有力的叙事医学形式。

叙事医学 (Narrative Medicine) 是“叙事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融合”，最早由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分校的多位临床医生、学者和创意作家在丽塔·卡伦 (Rita Charon) 的协调下共同提出。卡伦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医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担任临床医生，她还在英语和比较文学系史蒂文·马库斯 (Steven Marcus) 教授的指导下，凭借探讨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在 2017 年出版的《叙事医学的原则与实践》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 中，丽塔·卡伦写道，“叙事智识和技能可以让临床医生更加准确和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的患者，增进医患关系，进而提高医疗水平。”<sup>①</sup> 卡伦将叙事医学的原则定义为“主体间性、关系性、人格和表现、正义行为、仔细阅读 (或耐心观察) 以及创造力”，这也是叙事医学教育中应当遵循的要点。<sup>②</sup> 奥德丽·洛德的《癌症札记》以生命写作的体裁隐含了所有这些要素，更重要的是，她还在多样性上超越了这些要素。托马斯·考泽 (Thomas Couser) 通过走出传统病患札记的范畴，透彻地分析了这部作品多样化的跨界组成，指出它初步推进了癌症和种族主义相互结合的主题，同时又指出，治病救人不仅仅需要医生和外科大夫的临床专业技术。<sup>③</sup>

《癌症札记》由三部分组成，这体现了作者为了触及饱受歧视的女性以及这种疾病的潜在受害者，在整个包容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她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女同性恋与文学讨论小组的发言中呼吁将沉默 (通常指在接受治疗时所面临不公时的沉默) 转化为语言与行动的重要性，这些发言也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内容。她强调正在经历相同人生阶段的人们应该构建一个同类人的社区，这种想法将文学延伸到了读者的现实生活之中。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在论文《时间与叙事》 (*Time and Narrative*) 中指出，这种再塑造还构成了他从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的“时间内状态” (within-time-ness) 理论中推导得出的一种“关怀形式”。<sup>④</sup> 在洛德看来，医护人员忽略了被诊断为癌症并面临手术的患者所经历的情感过程，应该将这种关怀的理念引入到医疗护理之中。这种活动链的断裂被写入了《癌症札记》之中。作品的第一部分是洛德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所做公共发言的实录，在此之前，奥德丽·洛德简要地介绍了自己一年半的治疗经历，“在接受乳腺癌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半年后，我就开始写病中札记，并且这种习惯在本书收尾之后，仍将延续下去…… [以便] 记录我是如何将这场危机融入到我的生活之中去的”。<sup>⑤</sup>

第二部分“乳腺癌：一名黑人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者的经历”全面展现了生命写作的广阔潜力：作品中交替出现了她在医院写的短篇札记、磁带录音的抄本，以及她对医院治疗过程中痛苦经历的回忆。所有这些都再现了机械与抽象的治疗过程，似乎没有人关心患者自身的情绪波动。洛德在医院的最后几天里使用磁带进行了录音，后来她在家创作《癌症札记》时重放了这些录音，这是一

① Rita Charon, Sayantani DasGupta, Nellie Hermann, Craig Irvine, Eric R. Marcus, Edgar Rivera Colón, Danielle Spencer and Maura Spiegel,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

② Rita Charon, Sayantani DasGupta, Nellie Hermann, Craig Irvine, Eric R. Marcus, Edgar Rivera Colón, Danielle Spencer and Maura Spiegel,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 p. 4.

③ 参见 Thomas G. Couser, *Signifying Bodies: Disabil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Writ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9; Thomas G. Couser, ed., *Body Language: Narrating Illness and Disability (Life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2018; Huang Rong, Narrative Medicine in China: How Doctors Write to Understand the Profession, *Life Writing*, Vol. 17 (1), 2020, pp. 89-102.

④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62.

⑤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 8.

种借助技术设备的书写手段，因为她无法强迫自己在札记中描述这些过程。<sup>①</sup> 医院的机制抹除了所有的人类感情，将人降低到“患者”的地位，患者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在接受治疗的失去活力的人。医院的设立和组织形式也佐证了这一状况。

但我也发现（尽管当时自己不愿意承认）：我一直指责并痛恨的医院中无处不在的冷漠白色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它是一种充满温情的隔离色，可以让我继续冷漠无感地生活下去。这是一种没有情欲的空白环境，无差别，简单，被当做幼儿对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以继续保持情感上的空虚和精神上的漠然，无需为了自己或者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sup>②</sup>

“医院里极其冷漠的白色”会与患者黑暗的经历产生共鸣，并下意识地让她把种族主义与癌症联系起来。“没有人关心那些照在我脸上的忽明忽暗的可怕灯光，手术中身体被剖开时的恐怖声响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只是这一切的被动接受者。一纸诊断书让我变得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成了被放在医院苍白的轮床上，送给火神的黑色祭品”。<sup>③</sup>

洛德重复以“我记得”的形式开头，捕捉了这种人格解体与非人化的实例——“我记得”这种描述法是叙事医学工作坊中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可以很好地控制在场参与者的反应：“我记得自己在病房内痛苦地尖叫和诅咒，我还记得一个令人讨厌的护士狠狠地给我打了一针。我记得有个声音告诉我，安静一点，这里还有其他病人，我说，我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我也病人。”<sup>④</sup> 在第三部分，奥德里·洛德谈到了医疗行业的另一个方面：乳房再造的谬论。她既反对佩戴假乳，也反对手术植入硅胶假体，认为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不过是为了“提升办公室士气”<sup>⑤</sup>。在她看来，乳房再造不过是商家盈利的手段。与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 Voight）摘除乳腺的做法完全不同，洛德在多年前就不仅拒绝切除另一侧乳房以预防癌细胞转移，还拒绝了整形外科医生提出的乳房再造整形手术。就像她把种族主义与癌症列为等式一样，她将那些“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暴力与仇恨”的有色人种女性所遭受的痛苦，比作了代表腐朽和毁灭的“虚假幸福和再造假乳”。<sup>⑥</sup> 最后，她把“折磨女性和黑人的压迫”与“正在毁灭我们的地球以及地球居民的机械化和非人类文明的犬儒主义”联系在一起<sup>⑦</sup>，从而将思考的范畴扩展到一个跨越国界并覆盖整个生态的普世视野。

## 二、形成非裔德国人（Afro-German）的意识

奥德里·洛德的跨国性格最早源自于她的非裔加勒比血统以及她在墨西哥城几年的短暂停留；而在1984年，她接受在丹麦会议上偶遇的德裔美国人达格玛·舒尔茨（Dagmar Schultz）的邀请，成为柏林自由大学约翰·F. 肯尼迪学院客座教授时，这种跨国性格得以升级。在20世纪80年代柏林校园内外的德国社会里，她把将种族主义称为社会癌症的观点从美国引入了欧洲，并由此影响到了非洲，以及叙事医学的应用。首先，她的班里有黑人女生——这些女生或为非洲人后代，或为非裔美国大兵与德国妇女的后代，这为培养共情圈和宣传解放思想开辟了阵地。在与这些胆怯的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洛德为这个群体取了一个名称：非裔德国人。在这部札记中，她在后来1984年5月

①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 45.

②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 46.

③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 35.

④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 35.

⑤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 60.

⑥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 78.

⑦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p. 76-77.

23日写的日记中解释了这个名称：

非裔德国人。这些女性说，她们从未听说这种叫法。我曾问过一个黑人学生，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经历的？她说，“他们给我们起的最好的名字就是‘战争婴儿’”。但大多数德国黑人与二战并无关系，事实上，他们早在二战之前几十年就已经存在。我班上有几名德国黑人女性的非裔德国血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sup>①</sup>

奥德里·洛德与学生以及种族歧视对象的互动是一种双向的对话式救赎过程。为这些非裔德国女性起个名字是找到身份的第一步，不是为个人而是整个群体找到自己的身份。洛德鼓励这些女性从这个新发现的立场出发，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把自己遭受的歧视描述写成一个关于骄傲的故事，一个救赎的过程。在洛德的专业指导下，这个团体站立出来成立了一个组织，并把自己的故事写入了一部里程碑式的非裔德国人传记集：《亮明颜色：非裔德国女性的历史痕迹》（*Farbe Bekennen: afro-deutsche Frauen auf den Spuren ihrer Geschichte*），<sup>②</sup>这部文集在1992年被翻译成英文《展示我们的颜色：非裔德国女性的疾呼》（*Showing Our Colors: Afro-German Women Speak Out*）。<sup>③</sup>这本书以梅·奥皮茨（May Opitz）对在德非裔人群和“战争婴儿”的研究作为首篇，讲述了13位非裔德国女性的生活故事。英文版由奥德里·洛德作序。<sup>④</sup>在这篇序言中，她表达了对她们的声援，并倡导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黑人组织一个泛非联盟。她援引了梅·奥皮茨的研究，并通过引用维滕贝格大学的几内亚学生威廉·安东尼·阿莫（William Anthony Amo）在18世纪写成的首篇博士论文揭示了“渴求同情”的主题，并将白人至上主义的形成从罗马殖民地追溯至东德和西德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重聚。<sup>⑤</sup>她自豪地承认，自己在鼓舞非裔德国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中取得了成功，而且这些运动促成了“德国黑人倡议”（Initiative of Black Germans，简称ISD）。她们出版的这部自传合集还激发了其他非裔德国人写下自己的生活。伊卡·哈格尔-马歇尔（Ika Hügel-Marshall）的示例对人们了解这个群体所遭受的痛苦和歧视具有启发性意义。<sup>⑥</sup>伊卡是战后德国出生的大约4000名有色人种儿童之一，她在自传《流浪之家：我在德国的生活》（*Daheim unterwegs: Ein deutsches Leben*，1998）中描述了自己生活中遭受的各种孤立和排斥。她在保守的巴伐利亚州长大，是周围白人世界里唯一的黑人孩子，而且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一切是造成她痛苦的最大根源。奥德里·洛德提到了她与伊卡的谈话，以及伊卡整个童年生活中没有接触过任何黑人的经历，因为这严重阻碍了伊卡文化身份的形成。<sup>⑦</sup>这种痛苦的被排斥感在伊卡的母亲嫁给一名白人男子并为她生了一个妹妹，而后把伊卡送到儿童寄养所时被进一步扩大。多年来，伊卡的母亲一直避免与她有任何的接触。在自传的开头，伊卡写道：“白人感受不到社会中充斥的种族主义。他们会完全忽视种族主义

① Rudolph P. Byrd, Johnnetta Betsch Cole and Beverly Guy-Sheftall, eds., *I Am Your Sister: Collect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Audre Lor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7.

② 参见 Katharina Oguntoye, May Opitz and Dagmar Schultz, eds., *Farbe Bekennen: Afro-deutsche Frauen auf den Spuren ihrer Geschichte*,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1992.

③ 参见 May Opitz, Katharina Oguntoye and Dagmar Schultz, eds., *Showing Our Colors: Afro-German Women Speak Out*, trans. Anne V. Adam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

④ 参见 Rudolph P. Byrd, Johnnetta Betsch Cole and Beverly Guy-Sheftall, eds., *I Am Your Sister: Collect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Audre Lorde*.

⑤ Rudolph P. Byrd, Johnnetta Betsch Cole and Beverly Guy-Sheftall, eds., *I Am Your Sister: Collect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Audre Lorde*, p. 172.

⑥ 参见 Carmen Faymonville, *Black Germans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fication*, *Callaloo*, Vol. 26 (2), 2003, pp. 364-382.

⑦ Ika Hügel-Marshall, *Daheim unterwegs: Ein deutsches Leben*, Berlin: Orlando, 1998, p. 234.

的存在。”<sup>①</sup> 当她最终成功找到自己的非裔美国父亲并在美国团聚时，她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在自己的德国名字中加上了父亲的姓氏马歇尔。

伊卡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亲身体验契合了奥德里·洛德的观点：她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会像癌细胞一样传播的疾病。她在英文版的序言中写道，“种族主义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痕。”<sup>②</sup> 伊卡在冷漠的儿童寄养所中的生活就好比是她在“医院冷漠的白色环境中的经历”<sup>③</sup>。在1984年首次逗留之后，洛德后来又去过几次柏林，并从描述非裔德国女性遭受歧视和排斥的故事，开始转变为在德国统一这个历史时刻以及种族主义活动高涨的浪潮中，对德国社会的分析。奥德里·洛德1984~1992年期间在柏林的故事被达格玛·舒尔茨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并于2012年上映。<sup>④</sup>

### 三、纪录片《1984~1992：奥德里·洛德在柏林》

在我看来，《1984~1992：奥德里·洛德在柏林》(Audre Lorde: *The Berlin Years 1984-1992*) 这部影片展现了生命写作的多种族性，<sup>⑤</sup> 并将洛德在切除乳房后的遭遇的种族主义与癌症经历，与她在柏林墙后将种族主义视作疾病的经历进行了类比。这部影片充分利用了多种参与性的生命写作手法。<sup>⑥</sup> 作为一部传记片，它讲述了洛德作为她自我定义的“一名黑人、女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恋母情结者以及诗人”的各个生活层面，同时又果敢地加入了她的医疗经历和社交活动。达格玛·舒尔茨主要采用了按时间顺序的剪辑手法，片中包含很多诗歌朗诵、课堂讨论和公开露面的镜头，以及她和伴侣非洲研究领域教授格洛丽亚·约瑟夫(Gloria Josep)在柏林的日常生活场景。从事美国研究的教师以及女权主义活动家达格玛·舒尔茨作为叙述者，将这些场景与她自己以及同伴活动者的生活联系起来，以努力将她在美国期间与美国活动者的遭遇转移到德国背景之中。影片还包括与数名非裔德国女性的对话，特别是与伊卡·哈格尔-马歇尔的对话。我对这部电影制作的技术方面不感兴趣，因为弗兰克·梅赫林(Frank Mehring)使用了“补救”这个术语，来描述该影片将私人录制的视频转换成复合数字电影形式的技术手段。<sup>⑦</sup> 我关注的是传记与自传部分相互交织并共同构成的对生命写作形式的表演。在影片中，对非裔的种族主义歧视被视为一种社会疾病，一种可以通过诗意以及叙事医学智识进行反击的疾病。在纪录片的结尾部分，达格玛·舒尔茨引入了奥德里·洛德的癌症主题(见影片的第102分28秒到第107分10秒)。

这个片段发生在1985年，影片展示了奥德里·洛德在首次访问柏林的次年(1985年)重返柏林后制作项链的场景。手工的作品和动态的手指代表了活动的重要性，同时也代表着艺术创造与通过写诗来表达诗意有异曲同工之处。影片的导演达格玛·舒尔茨介绍了洛德罹患癌症以及在柏林求医治疗的经历。在影片中出现医生的身影之前，洛德的伴侣格洛丽亚认为曼弗雷德·库诺(Manfired Kuno)的帮助方法与美国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因为前者采用的是替代药物的治疗方法。曼弗雷德·库诺采用的是自然疗法。他很快用德语陈述了癌症发展的各个阶段，并指出洛德的癌症已经出

① Ika Hügel-Marshall, *Daheim unterwegs: Ein deutsches Leben*, p. 8.

② Rudolph P. Byrd, Johnnetta Betsch Cole and Beverly Guy-Sheftall, eds., *I Am Your Sister: Collect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Audre Lorde*, p. 172.

③ Audre Lorde, *Cancer Journals (Special Edition)*, p. 46.

④ Charly Wilder, Audre Lorde's Berl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9,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9/travel/berlin-audre-lorde.html>. 2019年10月20日。

⑤ 参见 Grace Sherrill and Jerry Wasserman, eds., *Theatre and Autobiography*, Vancouver: Talonbooks, 2006.

⑥ 参见 Maggie O'Neill and Philip Stenning, *Walking Biographies: Community,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in Downtown East Side Vancouver, Medialisierungsformen des (Auto) Biografischen*, München: UVK, 2013, pp. 215-243.

⑦ Frank Mehring, *Remediating Multi-Racial Memories: Audre Lorde's Berlin Years and the Genealogy of Afro-German Life Writing*, in Alfred Hornung, ed., *American Lives*,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13, p. 424.

现肝脏、腹腔系统以及卵巢转移。在接下来的对话中，他用英语告诉洛德，自己不会给她任何药物，但她必须要倾听自己的身体，要注意休息和静养。洛德表示，“这减轻了我的压力。”然后，库诺总结了他与洛德长达五年的交替治疗过程，并确信她能够比医生断言的存活期（通常被称为生命预后）多活三年半，因为她是一位极其不寻常的女性。他还指出整个治疗过程进行得比较艰难，因为在白人男性理疗师与非裔美国女同性恋者之间的互动中，难免会存在陌生的心理社会因素。在另一个场景转换中，我们听到了奥德里·洛德从商业角度上与听众探讨住院治疗与乳房再造整形术或乳房假体，她认为，这是将人变成物体，就像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所展现的那样。<sup>①</sup>这段视频以库诺对洛德的最终陈述结尾，他指出，洛德巨大的能量以及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起到了延缓死亡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奥德里·洛德充满智慧，而库诺认为智慧是对抗癌症的重要疗法。

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表示死亡是自传体文学的真正主题，<sup>②</sup>而死亡也是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一幕。对绝症的探讨方式以及对死亡的思考都采用了叙事医学的形式并对其进行了补充。有几个人通过行为或社交活动的形式参与了这个调解治疗的过程。在使用自然疗法和替代医疗方法对洛德进行为期五年的治疗过程中，治疗手段包括了她在伴侣格洛丽亚的悉心照护中二人的情感交流，以及背后精心设计的照护程序。而在贴身护理人员组成的圈子之外，则是她的朋友以及为她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的祝福者所组成的更大社交圈。格洛丽亚·约瑟夫两次重复说道，“柏林让奥德里多活了几年”，她口中的柏林指的是社会活动人士组成的社交圈。以这个朋友圈为起点，激进主义在德国背景下向整个社会蔓延，进而影响到整个欧洲和全球。这基于洛德列出的种族主义与癌症等式方程，并从她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延伸到了柏林的社会状况。在一段独白中她这样说道：“对于种族主义和癌症：在这两种战役中，侵略者要想取胜就必须征服对方，而抵抗者只需要生存就取得胜利。我该如何以及从哪一方的角度来定义我的生存？”（影片的第109分钟46秒）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和西德都发生了针对有色人种的攻击事件，与她在柏林第一次逗留期间相比，种族歧视以及被白人盯视的经历都有所增加。奥德里·洛德和她的伴侣格洛丽亚采取了公开行动，她们甚至给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写了一封关于德国仇外情绪和右翼活动复苏的公开信。共有7家报纸刊登了这封信，但这位政治家未给出任何答复。洛德认为，在这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愿景来引导人们。她指出，“如果没有愿景，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让人感同死亡”。<sup>③</sup>在这种形势下，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叙事医学社团成为了让她在人生最后时期依然保持创作激情的坚实防线。电影的结尾部分是1992年9月18日的一个场景，两个月后她在加勒比海的圣玛丽岛去世。影片的落幕是一个十字架，还有她的诗集《黑独角兽》（*The Black Unicorn*）中《生存的祷文》（*A Litany for Survival*）这篇诗作的最后一句：“我们从不应存活”<sup>④</sup>。

调整后的叙事医学从业者网络承认了这种诗意的智识的价值，并开始针对变化，为患者提出愿景。因此，洛德对于非裔德国人获得的新价值观和身份感深感自豪，她认为他们是创造跨国自我的推动力。<sup>⑤</sup>对她来说，欧洲的混血儿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如何创造性地处理多样性的绝佳机会。<sup>⑥</sup>他们拥有在多元民族社会中体现跨国自我的独特条件。她曾设想非裔欧洲人、非裔亚洲人以及非裔美洲人

① Rüdiger Kunow, *Material Bodies: Bi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18, pp. 200, 387, 405.

② Ihab Hassan, *Parabiography: Varieties of Critical Experience*, *The Georgia Review*, Vol. 34 (3), 1980, p. 593.

③ Rudolph P. Byrd, Johnnetta Betsch Cole and Beverly Gay-Sheftall, eds., *I Am Your Sister: Collect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Audre Lorde*, p. 173.

④ Audre Lorde, *The Black Unicorn*, New York: Norton Publishing, 1978, p. 32.

⑤ Stella Bolaki and Sabine Broeck, eds., *Audre Lorde's Transnational Legaci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5.

⑥ Audre Lorde, *The Dream of Europe—Remarks*, *Audre Lorde's Transnational Legacies*, in Stella Bolaki and Sabine Broeck, ed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5, pp. 23-26.



携手合作。<sup>①</sup> 她认为，这些非裔在描绘自己人生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创造性努力就是拒绝绝望、拒绝失明和拒绝沉默的明确信号。创作激情决定了奥德丽·洛德对抗疾病以及社会死亡的态度，这种精神也传达给了护理界。在《叙事医学的原则与实践》中，关于“创造性”的两章由美国作家内莉·赫尔曼（Nellie Hermann）撰写<sup>②</sup>。她运用写作技巧描述了自己如何克服会影响健康的个人低谷和悲剧。她在人生低谷写就的若干叙事札记在十年后集结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治愈悲伤》（*The Cure of Grief*）。“我运用写作技巧，”她解释道，“以一种对我的健康至关重要的方式。”<sup>③</sup> 内莉引用了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和玛丽安·麦克科尔迪（Marian MacCurdy）合著的《写作与疗伤》（*Writing and Healing*）<sup>④</sup> 中的内容，对他们来说，疗伤是一种“将被一段难以言说的经历冻结在记忆之中的单一自我，转变为更具流动性、更具可叙述性以及更具社会综合性的自我的过程”<sup>⑤</sup>。奥德丽·洛德的榜样和鼓励使得非裔德国女性学会利用叙事技巧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们运用了一种“创造性勇气”，罗洛·梅（Rollo May）认为，这种勇气可以让人们“发现新的形式，新的符号，新的模式，以此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sup>⑥</sup> 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可以抵抗人类的停滞和社会的死亡。归根结底，（生命）写作是我们人性的一种表达。<sup>⑦</sup>

综上所述，我想指出，我在讨论奥德丽·洛德与种族主义和癌症的斗争过程中所提到的生命写作智识与叙事医学的相互作用，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当前欧洲的移民危机。<sup>⑧</sup> 到目前为止，欧洲以及欧洲人民仍然没能找到任何明智和明确的方法来解决由于政治斗争、资本主义剥削以及气候条件的急剧变化导致的非洲难民的真实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与非洲的关系，后者被白人至上主义的殖民化和全球化侵占了资源。奥德丽·洛德站在种族主义立场上深知白人长期干预的后果，并呼吁所有具有非洲血统的人群开展泛非合作，开展新时代的马克思·加维（Marcus Garvey）运动<sup>⑨</sup>。她认为，领导者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拥有非洲血统，因为他们才与非洲大陆有着真正的联系。

……我们（与非洲）存在血脉的联系。除了在海外侨民中塑造我们各自的国家身份之外，非裔美国人、非裔欧洲人以及非裔亚洲人还面临着诸如以下的同样问题：我们与整个非洲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向强大和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什么，以及产生怎样的期望？我们作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在南部非洲解放斗争中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的责任又是什么？<sup>⑩</sup>

① Rudolph P. Byrd, Johnetta Betsch Cole and Beverly Gay-Sheftall, eds., *I Am Your Sister: Collect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Audre Lorde*, p. 170.

② Rita Charon, Sayantani DasGupta, Nellie Hermann, Craig Irvine, Eric R. Marcus, Edgar Rivera Colón, Danielle Spencer, and Maura Spiegel,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 pp. 211-254.

③ Nellie Hermann, *The Cure for Grief*, New York: Scribner, 2008, p. 219.

④ Charles Anderson and Marian MacCurdy, eds., *Writing and Healing: Toward an Informed Practice*, Urban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000.

⑤ Nellie Hermann, *The Cure for Grief*, p. 222.

⑥ 转引自 Nellie Hermann, *The Cure for Grief*, p. 214.

⑦ Nellie Hermann, *The Cure for Grief*, p. 224.

⑧ 参见阿尔弗雷德·霍农：《跨国及跨文化视角下的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王小木译，《华夏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第379~390页。

⑨ 参见 Erna Brodber, *The Continent of Black Consciousness: On the History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New Beacon Books, 2003.

⑩ Rudolph P. Byrd, Johnetta Betsch Cole and Beverly Gay-Sheftall, eds., *I Am Your Sister: Collect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Audre Lorde*, pp. 172-173.

我想，这也是我们身为研究生命写作的学者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为了促进这个人口组成和生态条件不断变化的世界健康发展，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贡献？

（责任编辑：权达）

## Life Writing Knowledge and Narrative Medicine: Creating the Transnational Self

*Alfred Hornung*

**Abstract:** Poetic and narrative 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often related to discrimination and disease, interact with psychotherapeutic or medical treatments. In an ideal situation, the cooperating agents of life writing and narrative medicine yield an ulterior form of communal knowledge with a transnational reach transcending individual self-realization and creating a framework for integration. This contribution focuses on Audre Lorde's poetic and narrative account of breast cancer (*Cancer Journals*, 1980), and takes it as a form of narrative medicine to explore the creation of transnational selves based on r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writing.

**Keywords:** life writing; narrative medicine; Audre Lorde; Afro-Germans; diversity in the U. S. and Germany